

探索清代中國的統治結構——山本英史教授訪談錄

Exploring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hina in the Qing Dynas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mamoto Eishi

佐藤仁史 (Sato Yoshifumi) *

山本英史 (Yamamoto Eishi) 教授，1950 年出生於日本滋賀縣草津市。東京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博士 (文學)。曾任教於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和慶應義塾大學 (Keio University)，現任慶應義塾大學榮譽教授、中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部研究員。曾經在中國山東大學、北京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清代史和中國近代社會史。山本教授是與岸本美緒、岩井茂樹、片山剛、三木聰等學者同輩的研究日本明清社會經濟史著名學者，在清朝地方統治和清朝史史料分析方面成就卓著，非常熟悉日本學界 20 世紀 70 年代到 21 世紀 10 年代的社會經濟史研究背景與脈絡。

一、對清朝統治發生興趣：學生時期 (1969-1979)

(一) 慶應義塾大學本科時期 (1969-1973)

1. 考進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佐藤：您在慶應義塾大學主修東洋史的機緣是什麼？在 1969 年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時，您對中國的印象如何？

山本：在讀高中之前，我對中國並沒有多大興趣，尤其是對當代中國。我上高一 (1966) 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日本報紙上每天都有同齡中國青年當紅衛兵的照片。在此之前，批判鬥爭運動逐漸展開，但到了那年 8 月，大批紅衛兵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一部分激進分子開始在街頭暴動。日本媒體對文化大革命持肯定



山本英史教授

* 作者現為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客座研究員。

態度，並將中國發生的事情報導為一場新的革命運動。當時，日本的學生運動也非常活躍，¹我認為當時的日本人對「造反有理」有一種似曾相似的感覺。我對摧毀寺廟和教堂以及批鬥等做法感到有些不妥，但也沒有其他的感想。

當時，我喜歡日本史和世界史，也比較擅長現代文學、古代文學和漢文。考慮到在大學發揮這些優勢時，我決定學習日本史或東洋史。於是，自然而然地報考了設有文學部的大學。在當時的印象中，只有在文學部才能學習歷史學。當時日本社會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比較重視應用性的學科，很少有男生想進入文學部學習。在我的母校東京都立西高等學校，理科生占大多數，其中絕大多數都想學習醫學或工學。我覺得自己在他們當中是個異類。事實上，公司從來不會主動招聘文學部畢業的學生。

佐藤：在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學生從一年級升入二年級時必須選擇一個專業。您當時選擇專業的理由是什麼？

山本：起初，我很想學習日本史。在日本史專業有一位叫高橋正彥的老師，他專門研究日本中世的古文書，我覺得他的古文書課很有趣。於是我問高橋教授我該選擇哪個專業，他推薦了東洋史學專業，我發現那裏有伊藤清司和可兒弘明等老師。儘管如此，起初我還是強烈傾向於日本近世史。大一的秋天，學校舉行了一次專業選擇說明會，當我走進日本史專業的會場時，教室擠滿了學生。然而，當我向隔壁的東洋史專業的會場望去時，卻只有 12-13 名學生。我覺得，就性價比而言，東洋史專業絕對是「物超所值」，學生人數越少，享受到的教育密度就越大。我還是被蒙騙了，因為有人告訴我，日本史所分析對象的面積只有 36 萬平方公里，而中國史研究對象的面積是它的 26 倍。選專業就是這樣。當時，我對畢業後做什麼工作漠不關心。我從沒想過要成爲一名學者，我只想學歷史學……。於是，我選擇了東洋史學專業作爲我的首選專業，第二和第三專業分別是日本史學和西洋史學。在不太熱門的東洋史學專業，

我的第一志願輕而易舉地實現了。

2. 走入中國史研究

佐藤：您從三年級開始參加和田博德教授的研究班（seminar），爲什麼選擇他？我想當年開課的還有伊藤老師和可兒老師。

山本：慶應義塾大學的東洋史學專業很早就有了分別專攻中國和西亞兩個地區的教師。我曾計劃學習中國史，但最初並沒有局限於某個特定時期。教授中國史的老師有伊藤清司教授（古代史）、竹田龍兒教授（隋唐史）和可兒弘明副教授（近代史和文化人類學）。當時，可兒副教授正在香港訪學，我在本科學習期間沒有機會聆聽他的任何講座。我在課堂上接觸最多的是伊藤教授。伊藤教授是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的專家。我對古代史也不是不感興趣，但他的研究方法是民俗學而不是歷史學。我怎麼也無法喜歡民俗學。我認爲，研究東洋史的正統方法是閱讀文獻資料，我想朝這個方向發展。大約在那個時候，竹田教授退休了，和田博德教授從商學部調到文學部來。和田教授成長於一個似乎以東洋史學爲家學的家庭，包括他的父親和田清博士，他的學術風格就是傳統的實證史學。我第一次聽說他的講座是在他負責的「東洋史概論」的課堂上，但不知何故，我被能夠進行實證研究（這在慶應義塾大學是少數）這一事實以及他本人有點與衆不同的個性所吸引，於是我決定加入和田研究班。

佐藤：我當時在選擇研究班時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之所以選擇山本老師的研究班，是因爲可兒教授採用的是民俗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而山本教授則是正統的文獻史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只是因爲自己學識淺薄，但我對可兒老師的作品有一種不理解的可疑印象。後來，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採取與可兒教授相同的研究方法。也許學風就是這樣形成的吧。

山本：當時，慶應義塾大學的中國史學是極其獨特的。著名民俗學家松本信廣爲慶應義塾大學的東洋史學專業奠定了基礎，因此民俗學成爲了學術傳統之一。慶

1 這裏的學生運動指的是 1968 年 -1970 年期間，由各所大學左派學生聯合組織的全學共鬥會議發起之學生運動總稱，當時與大學當局引起了激烈糾紛。

應義塾大學的東洋史學專業與其說是純粹的歷史學，不如說是附有歷史學的民俗學。因此，慶應義塾大學的中國史研究在日本的史學界處於獨特的地位，不同於其他大學的正統文獻史學。

3. 畢業論文：從薙髮令到遷界令

佐藤：您的畢業論文是關於遷界令的，當時有怎樣的問題意識呢？

山本：當我加入和田研究班時，我的興趣就已經從古代史轉移到更晚的時代了，但還沒有晚到近代，想研究近代之前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閱讀了一系列經典著作，如內藤湖南《清朝史通論》（1944）、稻葉君山《清朝全史》（1914）、宮崎市定《科舉》（1946）和《雍正帝》（1950），從而被清史所吸引。我認為影響最大的作品是《清朝史通論》。

佐藤：內藤湖南曾經當過記者，所以他的文章很有意思。宮崎市定的文字也很好讀，但他有些虛偽的論述。

山本：我並不是一開始就對遷界令感興趣，我之所以對此發生興趣是因為我覺得外來民族在中國的統治很有趣。我對清朝統治感興趣，是從一些簡單的問題意識開始的，比如征服王朝對漢族意識心態帶來的影響，包括華夷之分以及被征服的漢人如何反抗等問題。當我被問及我的畢業論文的具體主題是什麼時，我告訴和田教授，我想重點分析漢人對薙髮令的看法。薙髮令就是強迫漢人留辮子，而這是滿族的習俗。對此他回答說：「你無法研究這個題目，根本找不到有關辮子的文獻史料」。

然後他告訴我：「如果你想做這個方面的事，可以研究遷界令」。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遷界令。遷界令就是清朝海禁政策的一種，為了對抗鄭成功，清朝強迫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遷往內地，並封鎖與臺灣的交通。是否真的有可能封鎖整條漫長的海岸線？如果有可能，居民遭受了怎樣的損失？這個問題和我對薙髮令的興趣有相似之處。在現在看來，和田老師想說的，是關於辮子的習俗和遷界令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史料的留存方式上是有很大區別的。不過，由於後來出現了許多關於薙髮令的研究，我略感遺憾的是，即使是在當時，也並非不可能做這個題目。

最後，我就把遷界令作為畢業論文主題，我想這也是我第一次對清朝統治結構問題產生興趣。

佐藤：翻閱香港的家譜就會發現廣東沿海地區住民的居住地實際上因遷界令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山本：雖然文獻中寫遷界令在整個沿海地區都得到了實施，但實際上有很多地區並沒有貫徹，我覺得這就像中國的長城並不都像八達嶺那樣堅固一樣。這樣的現實在文獻中並不容易看到。我現在在想，畢業論文的選題過程可能就是觸發我研究興趣的契機，包括我對無法統一實施的種種政策，如何在史料中表達出來的興趣。

（二）東京大學大學院時期（1973-1979）

1. 考進東京大學大學院

佐藤：進入東京大學大學院後，您是如何形成碩士論文的選題以及相關問題意識的呢？考慮到當時日本的研究狀況，我認為「鄉紳支配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我想更多地瞭解一下您的選題和當時學界主流研究脈絡之間的關係。

山本：作為遷界令研究的延伸，我不得不閱讀一些與明朝禁海政策有關的文章。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傳統史學文章之外，我對使用社會科學方法撰寫的文章產生了興趣，比如那些發表在《歷史學研究》上的文章。大多數文章都是關於商品生產、地主制度和海上貿易的，但我們在慶應義塾大學並沒有學習過這些領域的研究。通過理論視角觀察社會的新鮮驚喜令我着迷。例如，片山誠二郎關於海禁與內陸生產結構的文章（「明代海上密貿易と沿海地方鄉紳層」《歷史學研究》第164號，1952）。在這些論文中，出現了福建鄉紳這一與商人和內陸地主制度相結合的存在。雖然我從一開始就對鄉紳不感興趣，但我越來越傾向於把歷史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來看待。

在準備畢業論文的過程中，我逐漸傾向於這樣的視角和方法，但我不確定如果繼續攻讀研究生，將朝哪個方向發展。當時，我發現可以從別的學校參加東京大學大學院的人學考試，於是決定試一試。老實說，我沒想到自己能通過考試，也沒想到自己能在那裏學習。不過，既然決定參加考試，我查了一下那裏有哪些老師，

就找到了田中正俊老師的名字。我知道田中老師的名字，是因為他在面向大眾的叢書《世界の歴史》（東京：筑摩書房，1961）第11卷中發表過一篇文章〈民變、抗租、奴變〉，這篇文章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讓我知道原來還有這樣描繪中國史的方法。於是我開始想，如果我通過了考試，一定要拜他為師。我記得當時我給文學部打了電話，詢問田中老師是否真的在東京大學任教。

佐藤：原來這就是你在田中正俊研究班開始學習的背景。

山本：我進入大學院的第一年很艱難。田中教授去英國訪學，一去就是半年。因此，西嶋定生教授邀請我去他位於我孫子市的家中做客。我想他是出於關心別的大學來的學生，想問問我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也想請教在大學院怎麼進行研究，所以很樂意拜訪。順便一提，西嶋教授曾因研究明代棉業史研究而出名，當時他已成為古代史方面的權威，這讓我對他產生了一種敬畏感。然而，當我真正見到他本人並與他交談時，我發現他為人却很溫和，這兩個不同的印象之間的差距令我感到驚訝。這也許預示着我後來對中國史中的「當為和實態」（即應然和實然）的問題產生了興趣。

雖然我考上了研究生，但起初我以為讀完碩士後會在一些普通公司找到工作，所以我天真地問西嶋教授：「有人讀完碩士後找到工作嗎？」他想了一會兒說：「以前有，但現在不多了」。對話的氣氛似乎並不融洽。我想他是想說：「只有碩士學位的人在大學找到教職工作的不多。如果不讀博士課程，就當不了大學老師」。當時，我聽到這句話時，真的覺得「我來到了一個糟糕的地方」。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認真學習。

西嶋教授對我說：「現在田中教授不在，你應該自由地學習，不要太拘泥於自己的專業。先讀韋伯和馬克思吧。接下來，再讀大塚久雄（討論西方資本主義形成的經濟史學家）和服部之總（研究明治維新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著作」。我遵照指示，默默地讀這些書讀了半年，但坦率地說，我並不覺得這些著作很有趣。這些著作相當難讀。即使仔細讀，也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佐藤：大部分想研究歷史的人都喜歡從具體史料中讀到的東西，而不是從理論出發。相反，當積累了一定

的研究經驗後，有條不紊地進行抽象化時，再讀韋伯和馬克思會更好。

山本：半年後，田中教授回到日本，他的研究班終於開始了，我開始認真學習明清社會經濟史。當時，賦役制度史是明清史研究的主要潮流之一。不過，雖然山根幸夫、岩見宏等學者發表了不少關於賦役制度的論文，闡明了賦役制度的結構和起源，但內容過於詳細，難以理解，所以我對它的興趣並不是很大。

與此相反，小山正明和重田德的研究很吸引人，他們通過賦役制度構建了明清兩代的歷史圖景。賦役制度是一種國家剝奪制度，並不直接揭示社會結構本身，但生產的基本結構是賦役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小山和重田的研究興趣強烈地集中在土地所有制如何與國家統治建立關係這一問題上。

受小山和重田的研究的啟發，我也對當時逐漸受到關注的，作為新興地主的鄉紳產生了興趣。通過這樣的過程，如何在賦役制度的變化中定位鄉紳的出現，成為我碩士論文的主題。

2. 碩士論文

佐藤：您碩士論文的具體題目是什麼？

山本：我給它起了一個誇張的題目：「清朝徵稅機構的改組與鄉紳統治」。論文講關於賦役制度史，尤其是清初鄉紳如何參與徵稅機構改組過程的問題，但因為我當時忙於收集史料，所以這篇論文並不是一篇能提出重要論點的論文。

佐藤：我想問一下您在田中正俊研究班學習情況。他的研究班以其從早到晚閱讀史料的嚴厲作風而聞名，您在班裏具體閱讀了哪些史料呢？能否講一下研究班的小插曲？

山本：研究班開始時，汲古書院已經影印出版了清代地方行政手冊《福惠全書》的日本刻印版，我們就從其中的「錢穀」部分開始閱讀，但由於裏面並沒有波瀾起伏的故事，半年後大家都感到厭倦了。之後我們開始讀蘇州在地地主陶煦寫的《租覈》。鈴木智夫先生在清水泰次的藏書中發現了這本書，因為它是講述清末地主制度的珍貴史料，所以受到大家注目（《租覈》的原文收錄在鈴木智夫《近代中國の地主制》，東京：汲古書

院, 1977)。對田中教授來說這是一部熟悉的史料, 他過去曾多次翻閱; 但對我們來說, 這是第一次閱讀的新史料。實際上, 這部史料總共只有 35 頁左右。即便如此, 我們還是花了五年時間才在研究班上讀完。

佐藤: 上田信教授在一篇散文中寫道田中研究班的一個小故事。他說: 有一次在田中教授的研究班上他們沒完沒了地討論龍骨車會向哪個方向轉動。對此, 上田教授認為他們應該去現場看看, 根本不必討論。

山本: 「龍骨車」這一詞出現在史料中。在戰前中國拍攝的照片中, 我們能夠瞭解這是灌溉農具, 即使表面上知道它們的樣子, 但無法知道具體怎麼運作。當然上田信教授說得有道理, 但我在大學院的時候日本與中國之間還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我們只能通過推理來解釋。所以一旦遇到問題, 我們就會討論個沒完沒了, 因此, 每一次閱讀史料最多是三行左右, 有時甚至只讀一行就結束了。

我們每周四上午 10 點 30 分開始, 最早下午 6 點結束。因為為了防止學生運動, 本鄉校區教學樓的燈都是下午六點熄滅的, 過了這個時間根本找不到出口。後來, 研究班準備出版論文集, 我們每個人都要做研究報告。下午 6 點鐘, 我匆匆離開教學樓, 田中教授就跟我們說: 「接下來我們搬到東洋文化研究所繼續討論吧」。就這樣, 我們有時討論到晚上 10 點左右才吃晚飯。東南亞史的助教常說: 「我很幸運沒有主修中國近代史」。

我們都必須為「魔鬼星期四」一整天的學習做好準備, 但我確信, 通過這樣的過程, 我們得到了徹底閱讀史料的訓練。比如, 同樣是「見」字, 但具體怎麼看的呢? 那麼, 就會有人在江戶時代荻生徂來和皆川淇園等漢學者的著作中找到相關的記載。這是一種日本漢學裏解讀中國典籍的傳統方式, 即從如何準確獲取史料中信息的方法。這種處理方法是在研究班上得到了訓練, 我想研究班裏受到這樣訓練的學生成為教師後, 他們也會將同樣的教學方法傳授給自己的學生。

佐藤: 原來如此。我想這種對每個字詞都仔細解讀的方式是日本特有的上課方式。這樣的方式意味着翻譯要準確, 但也意味着要深入思考每個字詞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裏的語境吧。

山本: 在碩士課程的第一年, 我參加本科生的演習

課。那一年, 新村容子和岸本美緒也選修了這門課。不過, 田中教授在本科生演習課中做的事情和在研究生的研究班上做的一樣, 閱讀第一手史料。史料是《皇朝經世文編》中的一篇短文〈恆產瑣言〉。岸本對它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後來還撰寫了一篇論文(《〈恆產瑣言〉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 57 卷第 1・2 號, 1976)。輪到我閱讀時, 我遇到了古代史中的一個重要術語「開阡陌」。「開阡陌」是一個關鍵詞, 到底讀作「將阡陌開拓」還是「開到阡陌」, 對周代井田法的不同理解起到決定性作用, 所以僅對這三個字的理解就有無數的文章。為理解這個關鍵詞, 沒辦法, 我只好讀古代史相關論文, 並在課堂上介紹了相關研究動向, 但也多虧了這些, 我才對井田法非常熟悉了。因為是這麼進行的, 所以對文本本身的解讀就很難有進展。

佐藤: 這是田中研究班的合影吧(見照片)。他們都是著名的學者, 可以說是全明星陣容。

山本: 這是 1979 年 3 月田中研究班在東京西郊平林寺舉行的聚會上拍攝的照片。可以說, 這就像是田中研究班的解散儀式。當然, 當時田中教授還沒有退休, 但研究班的大部分學生都在那一年畢業並離開了東京大學。



田中正俊研究班合影(1979, 平林寺), 前排(左起): 山名弘史、小林幸夫、新村容子、陳慈玉、岸本美緒, 後排(左起): 並木賴壽、栗原純、山本英史、片山剛、田中正俊、唐立(Christian Daniels)、久保亨、濱下武志、朴元熳

二、清朝統治研究的探索(1979-1996)

(一) 到山口大學赴任(1979)

佐藤：您於1979年離開東京大學，到山口大學擔任全職講師。當時您還只有20多歲。您在山口大學負責了哪些課程，又是怎樣上課的呢？例如，您使用了哪些史料？講授了哪些內容？學生們的反應又如何呢？

山本：我赴任時才28歲7個月。雖然很幸運地在不到30歲之前就成為了專職講師，但我不得不給只比我小七、八歲的學生上課。最初，我負責3門課：史料閱讀課、專題講座和畢業論文指導。教學任務本身不多，但專題講座却非常困難。要把我的研究內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講給本科生聽，難度非常大。起初，即使我竭盡全力做講義，整理出當天要講的內容，大約也只能講30分鐘，於是要拼命補上剩下的時間。當時，我既沒有閒聊的能力，也沒有閒聊可依據的文化積澱。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想方設法把準備好的講課內容拉長。一堂課一旦結束，我又得為下一堂課準備新的講義。為了做專題講座的筆記，一周轉眼就過去了。

佐藤：我完全無法想像，口才出眾的老師年輕時也是這樣！這也許是每個人年輕時都會經歷的道路，原來口才不好的並不是只有我一個。

山本：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選擇學生們容易感到親切的史料，譬如《點石齋畫報》等等。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本科生想讀什麼。因此，我選擇的史料竟然是《大清會典事例》這一索然無味的法令集。我個人覺得這份史料很有趣，但對學生們來說，被迫閱讀的却是這麼無聊的東西。也有學生向我抱怨說：「老師的課沒有名人出現」。的確，我的課沒有提到項羽和劉邦這類人物。對於熱愛歷史的大學生來說，那些故事才是有趣的。然而我給他們講授的卻是社會經濟史，在某種程度上完全無法理解，他們不感興趣是理所當然的。

佐藤：如果在史料閱讀課上先讀宮崎市定《雍正帝》，之後再閱讀《雍正硃批諭旨》等史料的話，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

山本：當時我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所以沒想過這些事情。當時我有很多空閒時間可以投入到研究中，但我沒有充分利用這一點。

許多主修東洋史學的學生都想成為初中或高中社會科教師。他們之中大約有一半人後來成了教師。因此，對他們來說，學習東洋史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因為他們是國立大學的學生，基本學力也相當高。他們從二年級開始閱讀史料，到四年級的時候，閱讀能力已經相當不錯了。山口大學因為是一所地方大學，可以去玩的地方很少，有些學生甚至在星期天也來演習室做預習，與我後來任職的慶應義塾大學的氛圍截然不同。漢文閱讀能力會隨着經驗的積累而提高。他們認真地對待史料，所以閱讀能力相當強。

佐藤：您在山口大學的研究情況如何呢？是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撰寫個別的論文嗎？

山本：在時間上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環境，本應能夠寫出論文，但在最初的3年左右期間，我忙於備課，所以即使我想做新的研究，也很難取得進展。而且，那個時代與現在完全不同，我根本沒有每年的業績評估等考核。這樣一來，就會不知不覺地流於輕鬆，或者應該說這是人的本性。

在我任職的第四年，我覺得這樣下去不好，於是我重新開始做研究，但最終我的積極性並不高，因為對為什麼要自己做研究，為什麼要教授別人這類問題我並不能弄清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1年左右。我想我在山東大學訪學是改變這種情況的轉折點。

(二) 山東大學訪學(1982-1983)

佐藤：請介紹一下您是如何到山東大學訪學的。

山本：當時，去北京留學的日本人越來越多，所以我也想去北京留學。當然當時我不會說中文，所以希望先到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學半年中文，然後到北京大學訪學一年左右。當時有政府資助的公費留學項目，也有包括日中友好協會在內的各種團體提供的留學資助項目。

我最後到山東大學留學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後，日本地方政府紛紛與中國各地城市建立友好關係。山口縣與山東省在地理和歷史上關係密切，並積極修復過去的歷史，希望開展經濟合作。在這種情況下，山口縣和山東省在建立正式關係之前就已經開始促進來往交流，山口大學校長也應

邀訪問了山東大學，並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在回國後不久，山口大學接到了一個邀請函：「希望按照當時的承諾貴校派遣一名教師來我校留學」。據說，山口大學方並未意識到自己曾做出過任何承諾。校長還說，因為訪問山東大學時遭到了白酒的「攻擊」，什麼都不記得了。但他跟我說：「既然我們做出了承諾，如果違背承諾就是違背信義。爲了中日友好，請你盡力而爲」。結果，我就被派往山東大學訪學。

接受留學生對於山東大學來說是一個新開始的項目。當時，大學還沒有做好接受留學生的充分準備，留學生部門尚未成立，也沒有留學生宿舍。關於山東大學所在地濟南的信息也相當匱乏。到了濟南之後，我才知道濟南爆發了肝炎疫情，那時我還以爲自己去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方。

不過，這裏的留學生活並非都是糟糕的。職工宿舍裏附設的留學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很友好，每天都在幫助我。因爲沒有專門的留學生宿舍，所以我們留學生住在普通職工宿舍的一角，因此與周圍的住戶非常親近。現在回想，與普通中國居民共同生活的環境是在北京留學無法擁有的珍貴經驗。另外，當時只有來自 6 個國家的 17 名留學生，所以我能夠和這些留學生交上朋友。由於肝炎流行，留學生只能整天在留學生食堂用餐，但這意味着每餐都能見到留學生們，因此我能夠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國際交流」。

佐藤：您曾在多篇散文中談到山東大學的訪學經驗，尤其是生活環境，印象最深的是什麼經驗呢？

山本：有三件事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當時的山東與北京不同，收集史料的環境並不理想，所以我可以把收集史料的時間用來體驗中國的社會生活，我覺得這對我的第一次留學經歷來說是件好事。第二，濟南作爲一個省會，受外來影響還不是很大，當時保留著古老的習俗。我認爲這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我很幸運能夠親身體驗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第三，我有機會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即如何縮小在留學前從書本上瞭解到的中國形象，與實際接觸到的中國之差距。

從山口縣渡過東海的另外一邊，存在著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景觀。20 世紀 80 年代初，那時文革剛剛結束，社會結構和人們的思維方式中仍有不少傳統因素。我開

始思考其中的原理是什麼問題，也開始意識到被視爲其源流的清代研究具有的當代意義。從此，我研究清史的熱情逐漸恢復。清朝制度實際如何運作這一問題與當時中國的情況也有很多共同之處。

佐藤：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生活中，黨和政府制定的規章制度雖然都是嚴格執行的，但當我們真正在中國生活時，會發現人們能夠將計就計或規避這些規定。因此，您在山東大學留學期間體驗到的制度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感，在閱讀史料時派上用場。

山本：沒錯。一般的情況下不可能實現的事情，通過有實力的人和大嗓門的人可以成功實現。亦即在這個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可以由個人的裁量權決定的事情，我瞭解到這與現代社會的法律平等是不同的。我意識到，這與前現代中國的情況並無太大不同，換句話說，無論從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來看，仍然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研究」（煙酒）的世界，亦即「人情」的世界。當然，這並不局限於中國，我相信在任何時代、任何世界，由人類組成的任何社會都可能存在這樣的因素，但在中國尤爲明顯。

（三）到慶應義塾大學赴任（1987）

佐藤：1987 年 4 月，您調到慶應義塾大學。當時的日本泡沫經濟已經開始，青年文化迅速發展，學生受到很大影響。當時，人們對中國的印象是地理上很近但不甚瞭解的神秘鄰國，我認爲整個東亞都有一種「新開拓地」（frontier）的印象。1991 年我升入二年級時，現在很難想像，東洋史學專業相當受歡迎。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許多學長和同學也有一種「開拓」精神，或者說是一種好奇心。老師對當時的學生有怎樣的印象呢？

山本：當時慶應義塾大學有很多學生就像是好奇心的「化身」。山口大學的學生是爲了將來的職業而認真學習，而慶應義塾大學的學生却不怎麼熱衷於學習，但他們充滿強烈的好奇心。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日本的最大特點，是泡沫經濟下日圓升值，這降低了普通年輕人出國的難度。此外，由中國回來的第一批留學生編輯的《地球の歩き方・中國》（《走遍全球・中國》）一書出版，分享了他們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引起了巨大反響。當時，日本年輕人去

中國很多人選擇乘船而不是飛機。往返於大阪和上海之間的「鑒真號」客輪提供學生優惠，單程票價為 16,000 日圓。這比東京和大阪之間的新幹線票價還便宜。慶應義塾大學的學生們在期末考試結束後有了空閒時間，他們在《地球の歩き方・中國》看到去中國旅行一天只需 1,500 日圓的消息後，紛紛在暑假或寒假期間前往中國旅行。此外，當時中日關係總體而言良好，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也很好，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也同樣正面，且改革開放後山口百惠和高倉健的電影在電視上播出，出現了一股日本熱潮，這意味着學生們在前往中國時不太可能遇到不愉快的情况。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到中國旅遊成爲一種流行的選擇，也是他們渴望瞭解中國的動力。

佐藤：由於澤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在當時相當暢銷，背包窮遊開始流行起來，即使是沒錢的學生，只要勤工儉學也可以去窮遊，在旅行中累積許多「英雄傳」，回來後講給同學們聽。我也和許多人一樣受到影響，揹背包乘坐「鑒真號」去了上海，在中國待了兩個月，也住過浦江飯店 24 人共處一間的房型（有朋友稱「野戰醫院」）。

山本：當時中東局勢穩定，很多學生去了西亞地區的很多地方。例如，去了德黑蘭，或在巴格達體驗了《天方夜譚》等等。當時有一個說法，說最安全的城市是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你相信嗎？這對於今天內向的日本年輕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總之，當時有日圓升值和世界局勢穩定這兩個幸運的因素，許多在國外有寶貴經歷的學生報名東洋史學專業，這是東洋史學專業的黃金時代。

（四）取得學術假期去海外訪學（1994-1996）

1. 北京大學（1994-1995）

佐藤：1994 年 9 月至 1996 年 3 月，您獲得了爲期一年半的海外研究資格，最初到北京大學訪學。在北大的 7 個月期間，您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您回國後利用徽州文書和族譜撰寫了一篇正統的社會史論文發表在《史學》上，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山本：1982 年我在濟南訪學時幾乎沒有機會收集

史料，因此我單獨在北京逗留 7 個月的目的就是收集史料。20 世紀 90 年代，在中國，閱覽文獻的環境有了很大改善。我閱覽的收藏機構首先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其次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圖書館。閱覽的主要文獻是清代的公牘，即地方官在履職時撰寫的各類政治文件。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文庫裏收藏著許多這類文獻，但與中國各機關的收藏總量根本無法相比。在此期間，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收集這些文獻上。

在北京期間我每天早上 7 點起床，吃完早飯就坐公車出發。我住在北京大學的專家樓，北京大學圖書館就在校內，中國國家圖書館也相對較近，但其他收藏機構都集中在市中心，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地鐵還沒有延伸到北京大學，但小公共汽車（一種爲少數人提供的公共汽車服務）相當方便。在每個收藏機構，我都抄錄文獻到傍晚。

佐藤：所以您整天都在「抄寫佛經」。

山本：關於你提到的徽州文獻和家譜，有以下的背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有一位叫周紹泉的教授，他的專長是徽州文書研究。自從我第一次訪問歷史研究所以來，他一直給予關心。他邀請我和他一起去安徽黃山市參加首屆徽學國際研討會。起初，我對徽州文獻並不感興趣，但他告訴我，如果沒有外國人參加，那就不是國際會議，於是我和同時在北京訪學的新宮學先生一起參加了會議。主辦方帶與會者去徽州一個叫西遞的村莊遊覽，我們偶然看到一戶人家在賣他們自己保存的徽州文書，大約有 20 張，用報紙包着，因爲很便宜，每張只是 2-3 元，我一下子就買了下來。當時，我只把它們當作紀念品。後來回到北京，我在歷史研究所的圖書館裏找到了這戶人家的家譜。我購買的文件上的許多名字都在家譜上有記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清晰起來。我當時想「這很有趣，我可以利用這些寫出一篇論文」，但我沒有閱讀徽州文獻的經驗，於是我請周教授幫我。儘管他工作繁忙，但每天一對一地教我如何解讀，這是我終生難忘的珍貴記憶。最後，我寫了〈明清黟縣西遞胡氏契約文書の検討〉（《史學》第 65 卷第 3 號，1996）。

在北京大學的訪學結束後，我到美國哈佛大學繼續海外進修。在此期間，我偶然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發現了一份契約文書，它恰好是東亞研究所戰前舊藏的一部分，也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仍在收藏的蘇州文書相關，回國後我就此寫了一篇論文〈ハーバードイェンチン圖書館所藏の清代契約文書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79卷第1號，1997）。這兩篇成果並不是我研究的主流，可以說是一種副產品。

佐藤：這時期，對中國的學者而言，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困難的時期。這時期所謂的「下海」現象尤其顯著。²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像周紹泉教授，還有我在留學期間師從的樊樹志教授，他們都真正熱愛學術、在艱苦條件下努力開展研究和教學，這些人對我們外國人也非常熱情。當然，我覺得他們當時年紀已經大了，想「下海」實際上是很困難，但他們有一種很強的使命感，一定要把自己的學術好好地傳給下一代。我在留學期間，樊教授一對一地教我明清市鎮史概論，這使我很感動，這也是我想成為學者的原因之一。現在回想，中國老師耐心地講學應該是這段時期的特色。

山本：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掙扎的人們終於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如果有人和你對同樣的事情感興趣，即使是外國人，你也可以無差別地分享你的知識。當時有很多這樣想法的中國學者。

佐藤：可以說，您在北京期間最大的成就就是收集了許多在日本看不到的公牘，是嗎？

山本：可以這麼說。那時我每天默默抄寫的史料，現在已經出版了很多影印本，其中的相當部分都可以很容易看到，甚至可以在網絡上找到一些圖像。從這個意義上說，抄寫可能是徒勞無功的，但在抄寫的過程中確實獲得了很多想法，並湧現了將它們整理成文的動力。基本上，我迄今為止的研究基礎都是在這個期間奠定的；所以，「抄寫佛經」絕非毫無意義。

2. 哈佛大學（1995-1996）

佐藤：那麼，您在哈佛大學的訪學期間有了怎麼樣的成果呢？

山本：在哈佛大學接待我的孔復禮（Philip Alden Kuhn）教授隸屬於東亞語言文化研究所（East Asian Language Culture Institute），所以我屬於這個研究所。不過，研究所與燕京學社共用一棟樓，直到現在我也分不清兩者之間的區別。

如果我是單身前來，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況，但當時我和家人在一起，說實話，因為需要照顧家人，能夠分配到研究的時間極其有限。但幸運的是，燕京學社是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心，全美和國外的學者都來學社，不用特意跑去美國各地拜訪他們。雖然我没有能力與那些我早就知道大名的學者進行完整的交談，但只要見到他們本人，瞭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也是一種成就。

我親自去找的人之一是芝加哥大學的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我帶着孔復禮教授的介紹信去了芝加哥，因為我們同年，所以很快成為好友，後來還請他參與合作研究。另一位是黃仁宇（Ray Huang）老師。我翻譯了他的 *China: The Macro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Inc., 1988；中文版：《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日文版：《中國マクロヒストリー》東京：東方書店，1994），所以我想找機會與他面談，於是直接到紐約郊區去拜訪他。這些都是我在美國才能做到的事情。

在美國期間，我得以仔細閱讀我在北京收集的史料。我常聽人說，訪學回國後，因為忙於其他各種雜事，始終無法抽出時間精心閱讀史料。不過，我很幸運，因為我在美國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在租處裏度過，所以我能夠抽出時間來分析之前抄錄的史料。

回顧我一年半的海外訪學成果，可以說，我能夠收集和分析大量新的史料，這為我之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佐藤：您所說的「之後研究」，是指促成您第二部著作《赴任する知縣：清代の地方行政官とその人間環境》（東京：研文出版，2016；中文版：《新官上任：清代地方官及其政治生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您的第一部著作《清代中國の支配構造》（東京：慶義義塾大學

2 下海一詞指的是在改革開初期，政府機關人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等放棄體制內的位置，轉到新出現的空間謀求發展這一行為。

出版會，2007)；是您碩士論文的延伸？

山本：《清代中國の支配構造》有三大主題，第一篇「徵稅機構の再編」側重於賦役制度，可以看作是我碩士論文的延伸。第二篇「清朝と在地勢力」主要基於海外研修期間收集史文料的成果。顯然，這一部份後來發展成《赴任する知縣》那本書。第三篇「鄉村管理と地方文獻」是匯集不同時期寫的論文，但却成爲後來研究地方文獻和鄉役的契機。

佐藤：換句話說，您第一本書的寫作方向得到了鞏固，第二本書的構思也有了基礎。您的作品從您 55 歲以後開始陸續出版，剛才聆聽您的研究歷程，我終於可以瞭解其中的背景了。

三、清朝統治研究的展開與深化 (1997-2021)

(一)「傳統中國的地域形象」合作研究項目 (1997-2000)

佐藤：1997 年至 2000 年期間，您組織了慶應義塾大學地域研究中心（現爲東亞研究所）的研究項目「傳統中國の地域像」（傳統中國的地域形象），後來於 2000 年出版了同名論文集。1997 年，我剛進入博士課程就擔任這個項目的助理，在參與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很大的啓發。當時，我完全不瞭解學術界的情況，以爲博士生參與這類項目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項目，成員都是著名的學者。順道一提，我當時被稱爲「茶坊主」（服侍茶室的小和尚）。這個項目是如何開始、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山本：回國後，我申請了大學的合作研究項目，並獲得了資助，於是我就開始思考要做什麼。戰後日本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者主要分爲二代。第一代是指那些在戰後不久從事商品生產等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者。具體來說，他們是西嶋定生、田中正俊、小山正明等老師。其中，西嶋和小山兩位通過實證研究奠定了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基礎。吸收這些成果並試圖加以超越的是森正夫和濱島敦俊等學者，可以說他們是第二代。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人是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中國

史研究在 20 世紀 80 年代逐漸衰落。我認爲，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屬於第三代，在三、四十歲的時候，我們開始質疑社會主義本身，部分原因是中國的天安門事件和蘇聯的解體。因此，我開始思考，是否有可能將我們這一代人組成起來，從一個不以階級論框架爲前提的新的視角——比如以地域社會的角度開展合作研究。

立項之初，我是團隊裡年齡最大的，將近 50 歲。最年輕的是山田賢先生，當時他只有 30 幾歲。中間有很多 40 多歲的學者。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很早就「明清史夏令營」(明清史夏令營)上相識並交流，因此我們彼此都很熟悉，我認爲在他們的幫助下，可以展開合作研究。有趣的是，每個人感興趣的方向都不一樣，因此我期待彼此可以討論和發展自己的地域社會論。在接下來的三年裏，我們致力於「傳統中國の地域像」項目。這個項目的最大成果是《傳統中國の地域像》(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0)的出版。儘管在理論方面不一定有顯著的成果，但我認爲這本書提供了一個擺脫僵化的階級論之嘗試。

佐藤：作爲助理，在參與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有一件逸事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在一次會議上，山本老師和岸本老師同時做了報告。事後，我和山田賢教授聊天時，他說山本老師和岸本老師的報告對比鮮明。岸本老師講述的是明末社會與大鄉紳之間的關係，而山本老師則從官方的角度看清朝初年的統治。換句話說，第一，



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教授演講會 (1999, 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 前排 (左起 3 位): 山田賢、岸本美緒、杜贊奇, 後排 (左起 3 位): 村田雄二郎、片山剛、孫江, 後排 (右起 4 位): 佐藤仁史、三木聰、新宮學、澀谷裕子

由於對象所處時代的差異，第二，由於視角不同造成的國家和社會形象的差異。不過，由於當時的我缺乏知識並沒有主見，只能回答「哦！原來如此」，根本無法與山田老師繼續討論，真是錯過了珍貴機會。我想請教與此相關的問題：您當時是如何看待岸本教授所描寫的，從社會角度看中國史形象，與您自己所探索的，從統治角度看社會的歷史形象之間的差異？

山本：我第一次知道山田先生說過這樣的話。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認為，許多明清史學家似乎都對晚明感興趣。原因是明末史料中有很多有趣的記載。明末是傳統社會秩序瓦解、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這意味着所有知識分子都以書籍的形式留下了他們坦率的意見。因此，明末的史料中蘊含着大量信息，從此可以窺見當時社會的真實狀況，這也是研究者們對其趨之若鶩的原因。與此相反，在清朝統治下，秩序被整頓、管理被加強，包括思想控制；變成了知識分子不能暢所欲言的時代，這也是清代知識分子的著作一下子變得乏味的原因。因此，明清史學家不太重視通過閱讀清初的史料來分析始於清代的獨特社會特色。

岸本教授對明末的社會流動化很感興趣，她關注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並提出了獨特的鄉紳論。相比之下，我的研究對象是清初，因此我對如何重建已經崩潰的社會更感興趣。雖然史料中的文字本身並不有趣，但我却被那些無趣材料中窺見的當為，和實際情況之間的複雜關係所吸引。在清朝的史料中，很難看到自下而上的社會，相反，從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自上而下的社會。我的問題意識是從著眼於此出發的。在這樣思考的過程中，我不知不覺地不再追溯到明末，而是對清初重組的秩序，後來又是如何崩潰的問題產生了興趣。

即使在今天，明清史學家的主要興趣仍在明末時期。因此，除了滿洲史專家之外，很難找到專門研究 17 和 18 世紀清朝史的學者。滿洲史專家說要研究清初必須掌握滿文，儘管研究中央政治世界是如此，但這並不一定適用於研究漢人聚居地區的地方統治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清初還有很多問題明清史學家可以去探索。

(二) 地方官研究 (1998-2016)

佐藤：在「傳統中國の地域像」項目中，您以公牘

為主要史料撰寫了一篇論文。其中，關於地方官員任職環境的論述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個方向的研究後來發展成《赴任する知縣》一書，這個方向是否意味着您在此時開始認真閱讀海外研修期間收集的史料？我想當時您在寫作《清代中國の支配構造》的同時，研究重點轉向了地方官的研究，這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山本：這要從我在與韓國等國家比較研究的科學研究費項目中，提交的一篇關於地方精英的論文說起。公牘類的文獻是地方官遺留下來的，當時我對它們與地方統治的關係產生了濃厚興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就地方統治而言，我認為清代也有一些相當有趣的史料。

佐藤：進入 21 世紀後，巴縣檔案的整理和分析取得了進展，但這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開展的研究。這些檔案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包含了大量的縣級檔案，通過查閱這些檔案，我們或許可以看到當時的民情和當地社會的實際狀況。然而，對於已經有了主題的研究人員來說，要深入研究是很困難的。利用這些檔案，我們必須全力以赴。因此，仔細閱讀各種史料仍至關重要。您在科學院圖書館和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圖書館發現了一批公牘之後，是什麼契機促使您編寫這些文獻的目錄呢？

山本：近年來，地方檔案作為法制史方面的史料備受關注。特別是巴縣檔案，可以說是清代 18 世紀以來四川省重慶府的地方裁判狀況的第一手材料。但其缺點是卷帙浩繁，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才能瞭解全貌。與此相反，判牘內容緊湊，雖然信息量比檔案少，但能簡單明瞭地介紹審判的概況。此外，地方檔案，尤其是縣級檔案只存在於有限的幾個地方，而判牘則涵蓋很多地方。這就是判牘仍是非常有價值之第一手史料的理由。

滋賀秀三教授的《清代中國の法と裁判》（東京：創文社，1984；熊遠報譯《清代中國的與審判》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附錄一個「判牘目錄」，介紹在日本收藏的判牘信息。不過，其中介紹的判牘除了一個明代的以外，都是清代的。然而，後來濱島敦俊先生介紹說中國大陸還有一些珍貴的明代判牘（濱島敦俊〈明代の判牘〉，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史料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我才意識到中國還有許多日本人不知道的判牘。因此，我決定申請科

學研究費對判牘的收藏情況做徹底的調查。這個調查的好處在於我們還可以訪問中國的許多城市。

(三) 從田野調查理解中國的基層社會 (2004-2021)

佐藤：2004年，以太田出先生為首的團隊獲得了科學研究費，開始了太湖流域社會史的田野調查項目，我們也一起參與了這個項目。您認為日本學者在中國開展田野調查的意義何在？

山本：外國人的中文水平肯定遠遠不如中國學者，即使在海外訪學期間進行研究，也不可能長期生活在中國，所以只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外國人從一開始就有這個不利條件，在調查的數量上也比不上中國學者。因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外國人本來就不應該做田野調查。我認為他們說得有點道理，但外國人做田野調查也有一定的意義。即使是同樣的田野調查，中國人和外國人也會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在日本史的研究中，外國人也能指出日本學者從未考慮過的一些理解日本文化的視角，在中國研究中也會出現這種情況。不過，就調查活動本身而言，中國人具有絕對的優勢。

佐藤：沒錯。如果不掌握語言，尤其是方言，就很難進行田野調查。

山本：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社會的限制。我們做調查的時候，環境比較自由，被採訪者說話也沒有太多顧忌，但還是有極少數人存有戒心。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讓外國人進行採訪，他們可能會非常警惕。

佐藤：在自由的氛圍中進行田野調查的那段時期，您有怎麼樣的具體成果呢？

山本：我認為，僅靠文字史料來準確反映基層社會的實際情況還是有局限性的。就中國史而言，其特點在於老百姓幾乎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只有壟斷文字的知識分子眼中的社會才被記錄下來。因此要想僅從文獻中弄清知識分子不太關注的無文字社會是怎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訪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這一問題。

佐藤：我認為，正是您在田野調查中與「圖正」³的邂逅引發了您的研究，並最終寫成了大作《鄉役と溺

女》(東京：汲古書院，2021)。當您直接採訪那位「圖正」的時候，最大的發現是什麼？

山本：從文獻中瞭解到的有關圖正的信息非常有限。在清代文獻中經常可以找到圖正等鄉役存在的記載。但是，清代的方志或士人撰寫的文獻中沒有更詳細的信息。因此，只有通過訪談，我們才能瞭解到他們過著怎麼樣的實際生活，以及圖正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等具體細節。此外，圖正在收稅時對農民的體度以及他們將職位交給誰，這些細節只有親歷者才知道，而這些信息很少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來。可以說，在既有的文獻資料中獲得的零散信息中，圖正就像一張沒有面孔的能劇面具。⁴與此相反，從訪談中獲得的資訊則是沒有帶能劇面具的真實面孔。

佐藤：話題換到《鄉役と溺女》，您怎麼想到編纂這本書呢？我想一個現實考慮是您作為南開大學的講座教授需要向南開大學提交成果，除此之外，您在學術上的動機是什麼？

山本：當時，我參加由我慶應義塾大學的同事、專門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關根謙教授組織的研究項目「近代中國の表象とその可能性」(近代中國的表象及其可能性)，必須就這一主題撰寫論文。清代的公牘中有不少禁止溺女的記載。溺女這個詞匯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開始關注它並收集史料。我們還發現民國時期的政府公報和《申報》中也有不少關於防止溺女的討論。因為這個項目的重點是近代，所以我對民國時期的文獻也做了一些研究。

統治者的想法是，溺女和鄉役都有其危害性，都應予以禁止，但是否能完全禁止還很難說。我發現這兩個主題有共同之處，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並沒有滲透到地方社會，這兩件事情就是其象徵。我是在2013年左右開始研究溺女的。

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我原本將重點放在鄉役上，但在與太湖漁民的訪談中，一位知情者說他知道解放前溺女的事，於是我決定也問問他。他出生於蘇州的一個地主家庭，土改時曾直接向劉少奇上訪，他向我講述了即

3 清代松江府的鄉役之一。主要從事分發由單、開具土地買賣證明等職務。

4 能劇是日本傳統表演藝術能樂的一個分支。它使用面具進行表演。

使在地主家有時也要溺女的現實。

四、對未來中國史研究的寄托

(一) 關於中國史的方法

佐藤：回顧您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能否談談您的工作中哪些問題意識一直存在？

山本：我認爲歷史研究方法有兩個途徑：一種是根據理論解釋歷史的歷史學。與此相反，另一種史學是：認爲最好不要有特定的理論，或者不受理論的束縛來理解歷史。當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們對沒有理論的史學不屑一顧。「他沒有理論」這樣的評價成了一種批評。我們的大前提是有一種有固定框架的理論，我們認爲根據這種理論解釋歷史就是一種科學。回想起來，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從屬於經濟學和哲學。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情況。

然而，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由於認識到我們一直依賴的理論並不一定是絕對的，我們開始相對自由地思考歷史。我們開始認爲，歷史學要擺脫對其他學科的從屬支配地位，就必須「以歷史本身研究歷史」。

那麼，「以歷史本身研究歷史」意味着什麼呢？這做起來很難。歷史學是人文科學的一部分屬於常識，但人文學科仍然是一門科學。那麼問題來了，科學究竟是什麼？我認爲，從根本上說，支持科學的一個主要條件是，它以客觀的視角來判斷事物，而且是可驗證的。歷史科學的存在離不開以史料爲基礎的「以事實爲依據驗證真理」這一基本前提。

然而，至少在 20 世紀 70 年代之前，中國的史學一直深受政治影響，存在着一種強烈的傾向，即通過討論歷史來支持政治主張。這種情況逐漸得到緩解，到本世紀，按照「實事求是」的方法進行的研究蓬勃發展，這對我們外國學者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情況近年來在中國似乎有所倒退。令我擔憂的是，一種利用歷史學爲當前政治局勢辯護的傾向有所「復興」。還有一種明顯的傾向是忽視或歪曲歷史中的消極方面。這不是「正視歷史」應有之義。有鑑於此，歷史學的使命仍然是實事求是地尋求真相。

佐藤：隨着研究內容的深化和變化，您對中國的印

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或者說沒有發生變化？就您剛才所說的而言，我認爲您在山東大學的經歷非常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讓您意識到，需要在理解理想與現實、假象與真相、真意與偽裝之間的差距的基礎上，全面地瞭解中國。

山本：是的。面對紛繁複雜的分析對象，想要理解它，依賴一種理論是容易想到的，這種理解方法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僅憑這一個方法並不意味着你已經完全理解了分析對象。中國社會是多元的，如果你從某一個角度去看，所看到的只是某一個側面。但是，如果你稍微改變一下視角，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因此，僅僅依靠單一的理論，無法保證一個全面的理解。這是中國學界一直存在的問題。我認爲，這是在相對簡單的環境中成長的日本人在觀察中國社會時必須牢記的一點。

同樣，當日本人試圖用日本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社會時，我們可能無法看到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說中國落後或有錯誤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我們用不同的尺度來衡量，落後的一面實際上可能是進步的一面。戰前的日本人認爲，與日本相比，中國社會停滯不前。我不知道是否存在絕對的停滯。另一方面，雖然我們談論進步，但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什麼是絕對的進步。

佐藤：沒錯。如果試圖用「絕對」的標準來判斷，就會出現很多方枘圓鑿的情況，結果就無法完全把握真實的面貌。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往往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這不僅限於中國史研究，試圖以「正確性」爲標準來看待歷史，這種看法本身就等於否定歷史學。「正確性」到頭來只是事後諸葛，那麼以此判斷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不就錯漏百出嗎？如果我們誤以爲指責「不正確性」就是歷史學，那麼歷史學存在的理由就幾乎不存在了。即使看起來「不正確」的事情，但如果不思考人們爲什麼會這樣想，或者他們是如何形成這種思維方式的，我認爲這就不是歷史學。

山本：這就是爲什麼歷史學有被用於其他目的的危險。很多人普遍以爲這樣被利用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人們很難理解事實並非如此，歷史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

(二) 瞭解中國的意義

佐藤：接下來是最後一個問題。這也是使我非常苦惱的一個問題，或者說，是已經有點想開了的問題。在當前歷史學日益邊緣化和中國形象極度惡化的情況下，要解釋日本人研究中國史的意義變得越來越困難。我想就這一點向您請教，特別是針對年輕學者和學生，能否談談您的看法？

山本：我認為研究中國歷史主要有兩個意義。一是研究中國史作為歷史學的意義，二是研究中國史對於瞭解中國本身的意義。

在史學研究中，實事求是地討論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在當今的政治世界中，討論歷史往往只憑感覺，沒有事實根據。如果沒有實物證明，以這種毫無根據的方式講述歷史就沒有任何意義。情緒化的歷史在中日關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我認為，史學思考是要用適當的證據進行論證，並通過論證認識到觀點的分量。因此，史學作為所有人的基本思維方式是相當必要的，其基礎在於第一手史料，是否是在此基礎上追求真理。

日本人通過歷史研究瞭解中國的另一個意義也很大。原因很簡單：我們有必要加深對中國的瞭解，因為從歷史上看，中國是與我們關係最深的國家，而且這種關係今後也不會改變。對日本人來說，中國史雖然是外國史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說是外國史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

佐藤：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在無法搬家的情況下，如何與不尋常的鄰居打交道的問題。

山本：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們都必須與他們打交道。我們和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積累了深厚的關係，相互之間的影響很大，它們並不是現在突然出現在我們身邊的。正因為如此，即使在閉關鎖國的江戶時代，日本人也能在漢學這一獨特的學術範疇內，從中國獲取必要的資訊。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學到了許多東西。即使在今天，這一基本路線也沒有改變。我認為，我們不能僅僅根據目前的關係，而不考慮歷史中形成的情況，就說這或說那。

日本人的另一個特點是，當與一個國家的關係惡化時，這個國家本身的形象也會惡化。當一個國家的形象變差時，難免會有一種不想進行該國研究的情緒。

佐藤：但這只是在用蓋子蓋住氣味的想法來推遲問題的解決。

山本：在上述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一樓，有許多關於日本的書籍，二樓是關於中國的，三樓是關於越南的，四樓是關於中東的。這些都就是歷來與美國開戰國家的資料。每次開戰，都會有大量預算用於研究敵國。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與美國的不同。

正因為當下中日關係極度惡化，日本人研究中國意義才更重大。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我想對年輕人說的是，要想瞭解中國，首先要培養對中國的感受性。因為歷史學仍然是一門通過閱讀史料瞭解對象社會的學問。近年來，史料開放的環境與過去相比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打一個比方，無論大型超市裏有多少珍稀食材，有多少食譜書籍，烹飪一道好菜的決定因素終究是烹飪者的舌頭和技巧。舌尖就是歷史學上的感受性。社會是人創造的，瞭解了人，自然而然地就瞭解了社會。那麼，如何培養理解人所需的感受性呢？我認為，就是廣泛學習不受學科限制的人文學科，也就是通過關注小說和電影等廣泛的表現形式來體驗人生，通過交友和談戀愛來獲得實踐經驗。這些都是認識人的捷徑。

另一個決定因素是廚師的技能。無論你的味覺訓練得有多好，如果你沒有烹飪美食的技能，你最終只能成為美食評論家。閱讀史料和文字表達的能力，就像廚師的訓練一樣，除非在年輕時就徹底做好，不然等年長以後就很難提高。

此外，瞭解中國尤其需要的是「土地勘」（とちかん、即對當地的瞭解）。內山完造說：「只有通過在中國體驗生活所獲得的『生活文化』，才能真正瞭解中國」。這句是至理名言（內山完造《生ける支那の姿》東京：學藝書院，1936；尤炳圻譯《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上海：開明書店，1936）。體驗「生活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出國留學。只有體驗了中國的生活，加深與中國人的交流，接受中國文化衝擊的洗禮，才有研究中國和其歷史的動力，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學習和深入瞭解中國的意義。

但遺憾的是，當前中日關係惡化嚴重阻礙了這一進程。這種情況不僅對日本，且對中國也有很負面的影響。